

The New School Calendar in Haicheng County's Village Primary Schools, 1905-1919

Elizabeth VanderVen

新校历：海城县村小 1905-1919 年的变革与意义

樊德雯¹

Abstract

In 1904, the Qing government launched a new school system, abolishing the Civil Examinations the following year. As part of the new educational reforms,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troduced China's populace to modern educational methods that included a new calendar with notions of time corresponding to modern, Western measurements. This article specifically examines how central reformers, local officials, and villagers from Haicheng County, Fengtian Province implemented the new school calendar. Drawing primarily on local archival sources dealing with school hours, opening dates, and holidays, this article challenges both the long-held notion that the new school system retained too many traditional and Confucian elements, and its antithesis, that the new system too abruptly departed from tradition. Rather, Haicheng's primary schools effectively integrated the Western week and clock time, with familiar elements of flexible and agricultural time. The interaction of old and new resulted in a mixed system of telling time in different ways for different occasions. The article further discusses how the new calendar contributed to a new temporal system around which people identified with multiple communities. The Lunar calendar, with more flexible concepts of time, represented the

¹ 我诚挚地感谢黄宗智教授、郭贞娣、沈睿、张家炎和其他参加“庆祝白凯教授教书生涯：从档案角度重新思考现代中国历史的国家和社会会议”的与会者，感谢他们给我的鼓励和建设性的建议，帮助我修改这篇文章。我特别感谢熊春文教授，感谢他辛劳的翻译。该文是根据作者发表在《二十世纪中国》特刊“现代中国的教育，文化与政治：‘纪念斯蒂文·C·阿维利尔的生活与工作’”（37卷第二期，2007年）一文而修改的。网站请见：www.maneypublishing.com/journals/tcc 和 www.ingentaconnect.com/content/maney/tcc。该文也是 Elizabeth VanderVen 著作《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学校》（2012）的章节重印，也获得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允许，版权归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樊德雯，博士，独立学者，Email: vanderven.elizabeth@gmail.com。

agriculturally-based local community, whereas the unprecedented regimentation of the school week and clock time represented a nationally-oriented cosmopolitan community.

Keywords

China, education reform, education, schools, school calendar, villages (rural conditions)

摘要

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新的学校制度,次年废除了科举考试。作为新教育改革的一部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给中国民众引进了一些现代教育方法,包括根据现代、西方的时间概念而制定的新校历。本文特别考察了中央改革者、地方官员以及来自奉天省海城县的村民是如何运用新校历的。本文主要运用涉及学校上课时间、开学日期和节假日等信息的当地档案资料,挑战了长期以来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新的学校制度保留了太多的传统和儒家因素,另一种观点与之相反,认为新制度过于偏离了传统。本文提出与以上不同的观点:海城的小学校卓有成效地整合了西式星期和时钟时间以及老百姓所熟悉的灵活的农业时间。新旧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混合的时间叙述系统。文章还进一步探讨了这一新校历如何促成一种新的时间系统,使人们得以与多重社区生活保持协调一致。农历是一种更加灵活的时间观念,代表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地方社区,而前所未有的学校星期和时钟时间系统则代表了一个国家导向的全球城市社区。

关键词

中国、教育改革、教育、学校、校历、村庄(农村条件)

1904年,清政府实行新学制,翌年废除科举考试,此前大部分的中国教育是围绕着科举制度运转的,已经运转了很多世纪。新建的学部把支配科举考试的以儒学为基础的课程替代为一个新的纳入西方和日本元素的体系。中国的广大村庄社区被号召建立小学,这些小学要求执行前所未有的新标准。新学校制度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引进了具有高度规制性的基于年、星期和小时的学校日历。本文重点考察1905-1919年间奉天省(今辽宁)海城县农村小学实施新校历的过程,这一时段包括了1911年清朝覆亡和1912年民国教育部取代清学部的过程。本文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一过渡时期,中央和海城县地方政府是如何试图把新的时间架构植入到海城县的村民当中的。在这一过程中,新旧时间观念如何相互作用造成了一种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呈现的有效的混合时间系统。

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者倾向于从两种角度看待新建立的教育制度。他们要么把它描述成非常传统的、基本上以牺牲现代的“有用”科目为代价而倾向儒学传统的教育,要么相反,认为它不够传统;让不

熟悉的科目和现代方法压倒当地的、长期有效的教育实践。这些改革者很多来自城市地区，为大众教育刊物撰稿，并写教育方面的册子和论文。比如，在1911年，一位名叫何劲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在一篇发表于《教育杂志》的文章中批评说，儒家经典对于学龄期的儿童来说太深奥了，他建议将其从小学教育中删除。（何劲，1911: 5.52-54）其他的，像董渭川（民国时期做过安徽省和山东省教育厅的督学）、廖泰初（一位曾于20世纪30、40年代在山东和四川做过农村教育调查的社会科学家）等人则从相反的方向出发，指责引进“西式”课程和外来教法的新学制牺牲了旧式儒家教育的適切性（《教育大辞典》，1997: 1:288；廖泰初，1949: 19-67）。

有些现代历史学家基于当代观察的发现也认为清末民初的农村学校脱离地方民众的需要。例如，萨莉·博思威克（Sally Borthwick）指出，当新式农村学校疏离于广大农村之时，私塾这种传统学校则一直流行于中国农村。罗志田描述了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农民和精英们如何倾向于拒斥新式学校和所谓的“洋教法”（Borthwick, 1983: 尤其是第2章；罗志田, 1998, 2006）。

本文依据海城县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主要集中于新学校体系的一个元素——校历，呈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这些与开学日期、学校假期、以及规定时钟时间等问题相关的丰富的档案资料表明，至少就校历的问题而言，基础教育改革既不过于倾向传统的儒家教育，也不过于现代、以至于脱离中国乡村生活的实际。通过对校历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小学如何展现了一种把新的和旧的、传统的与现代的、西式的与中国的元素包含在一起的时间概念。新校历把一种现代规范的时间概念引进到海城县村民当中，这种时间概念奠定在一周七天和钟表时间的基础之上，但结合了他们熟悉的那些更加灵活的农业时间元素。对这些多元因素的平衡主要源于代表不同利益参与者的一种有意识的策略，这些参与者包括1904年（以及后来1912年）学校规定的制定者，县地方官员和村干部。总体来说，尽管并不总是与其目标相一致，他们所设法建立的机构还是很好地适应了农村的条件并在清末民初时期获得了相当快的增长。还有一项引人注目

的是，村庄社区自身是如何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以锻造一个国家规定的与村民认可并践行的时间概念的混合体的。然而，重要的是应该记住，村庄社区对于新式教育活动的参与同时意味着也把他们置于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府介入与监督的范围之内。

而且，通过把校历分解成三个不同的层次——年、星期、小时——考察它们如何在学校得到实施，我们可以看到新校历是如何扩展海城县青年一代的视野的，促使他们在农村社区中同时展现国家和地方范围的身份的。一些学者发现，在民国时期，许多城市（和一些农村）居民同时查看阴历和阳历，这取决于哪一种日历更适合他们的需要，以示他们在多个共同体中的身份（Harrison, 2000: 65-69）。事实上，当这个过程早在1907年开始发生在海城县的时候，它很可能正是通过农村小学，许多中国人才第一次接触到现代的时间概念。

东北及海城县的现代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教育是随着把东北与中国其他地区纳入一致管辖的几次大的转变进程而进入奉天省和海城县的。这些发展进程包括越来越多的其它省份（尤其是河北和山东）移民的迁入，铁路的建设把整个省域内的主要城市中心连接起来，以及该区域内改革型领导的崛起（VanderVen, 2005: 207）。尤其是那些有意采用新政的改革型领导大大促进了东北地区教育机构的迅速增长和发展（Enatsu, 1991: vi-ix; Gottschang and Lary, 2000: 2, 8, 45-46; Mitter, 2000: 68-70; Suleski, 2002: 5; VanderVen, 2005: 204-235）。

特别是在短暂但高效的徐世昌总督治下，教育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徐上任的1907年到他下台的1909年，奉天省有2113所学校得以建立，其中包括专门学校、师范学校和中等学校（《辽宁教育史志资料》，1990:1:300-303；李喜平，1998: 208）。徐的后任领导人则跟随他的脚步。如在他的继任者锡良（1909-1911）和赵尔巽（1911-1916）治下，奉天的学校和学生数量均取得成倍增长。到1913年，奉天的小学校数量超过5000所，小学生数量则超过

200,000人。到1923年张作霖牢牢控制该区域时，奉天省有8741所小学和接近400,000名小学生(孙，董，张，1993: 5)。大多数的小学校都设在农村，散布在奉天省的48个县市。海城县拥有的小学数量之多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到1907年，该县有333所社区（公立）小学在正常运转，入学人数超过9000名。这个数字在清末余下的时间和民国时期仍在继续增长。到1924年，该县的小学数量达到364所、入学人数近19000名(《海城县志》，1987: 483; 《辽宁教育史志资料》，1990:1: 300-305)。

海城县在初等教育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可以归功于上文提及的发展以及该县地理位置和经济状况的优厚条件。海城县地处辽东半岛的中间地段，位于省会城市盛京（今沈阳）和港口城市大连之间。20世纪初年（大约在1905年），海城县被由日本所控制的南满铁路线分成两个部分，这就使得它能够更好地与奉天省的其它地区融合，而且使它更容易接受诸如现代时间与安排表之类的新观念(VanderVen, 2012: 25)。此外，海城县还是一个繁荣的农业中心，拥有肥沃的大平原，农民长期种植着玉米、高粱、大豆和水稻(《海城县志》，1987: 1-2; VanderVen, 2005: 207-208)。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讨论的那样，海城经济状况的相对稳定意味着许多农民生活在生存水平线以上，使得他们有能力把精力导向教育改革上面(VanderVen, 2012: 29-35)。

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新时间观念

新校历的目的是标准化和规范化学校时间，是20世纪早期中国的一场更广泛的引进现代时间观念的运动的一部分。在中国，正如其他地方的案例显示的，新政权很快推出新的计算时间的制度，作为巩固其合法性和给民众传播新价值的方法。²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孙中山(1866-1925)便正式把西历（阳历）介绍到中国来。引

² 以下学者讨论了不同背景和时期的政权更替与日历变更的关系: Qin Shao (2004), ch. 2, 86; Anthony Aveni (2002), 127; Jonathan D. Spence (1996), 142; Nicholas V. Riasanovsky and Mark D. Steinberg (2005), 204; Mark C. Elliot (2005), 31-32; James A. Flath (2004), 52; Richard J. Smith (1988), 9, 1: 123; and Lynn A. Struve (2005), 4-5.

进阳历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代传统的阴历。另外，起源于《创世纪》、由基督教创造的七天为一星期日历方法，也在城市地区流行起来（Aveni, 2002: 89; Harrison, 2000: 65, 69）。时钟，既作为一个具体的物件、也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时间标志，在城市地区也在一些城镇及其郊区，尤其有工厂和学校的地区，变得越来越流行。无论好坏，这些现代的时间观念都大大改变了民国早期那些生活在城市地区和边疆城镇的居民的日常生活。³ 有些地方创造性地把阳历整合进传统的标记时间的方法中去。例如，在长江下游地区城镇——南通，居民以挂灯笼的方式纪念国庆节（双十节），一个新的民国节日，这一方式传统上只在农历元宵节才实施（Shao, 2004: 88）。⁴ 在其他地方，如上海，由于阳历和时钟时间在城市白领工人中间的普及，使他们得以把工作和休闲区分开来，以留出周末到周边的旅游胜地杭州去参观，一个新的旅游业出现了（Wang, 2000: 112-13, 116-17）。⁵ 在哈尔滨，人们对作为热门商品的外国怀表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需求（Carter, 2002: 45）。

相反，农村地区对于这种新的时间建制表现出更多矛盾的心态，他们发现这种新的时间在最好的时候是没用的、最坏的时候则具有破坏性。在山西省的赤桥村，普通老百姓不管新的阳历而继续依据农历庆祝新年（Harrison, 2005: 97）。在南通的近郊农村，到该镇工厂工作的农民对于精确标记时间的工厂时钟非常苦恼；如果农民在标志着一天正式开始的钟声敲响之后哪怕一分钟到达工作现场，他们也将被遭遇解雇（Shao, 2004: 89-90）。

在20世纪早期新的时间观念引入之前，中国的农村依据自然的农业周期、农历、以及大约每五天一次或一句两次的定期市场来组织他

³ 我采用伊唯塔·杰鲁巴维（Eviatar Zerubavel）描述的“时钟时间”这一概念，杰鲁巴维把它定义为按24小时周期计算的西方时间，依据机械钟，每一点时间都是持续统一的（Eviatar Zerubavel, 1981: 12, 37-38, 61-62）。

⁴ 元宵节的时间在农历正月十五。

⁵ 除了日历外，王还强调了铁路的重要作用，因为铁路大大缩短了上海和杭州之间的距离，由原来坐船所需的3天缩短为仅仅需要3个半小时。

们的工作和社会安排 (Shiba, 1977: 428; Harrison, 2000: 69)。⁶ 因此, 正如哈里森所表明的那样, 乡村生活从来是一个多元化的时间概念, 它的每一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的含义, 这取决于不同的情境 (Harrison, 2000: 67-68)。大多数农民主要围绕农业的周期来组织他们的日常生活, 基本上依据农历, 但根据区域种植模式而有所不同。人们普遍遵守农历的节日。⁷ 在这些天里, 人们停止工作, 庆祝节日, 一般也还清旧债。定期市场则表现出更加频繁的时间规律性, 尽管当天气恶劣的时候, 大多数东北地区的村民倾向于在县城所在地或通过流动小贩进行经济交易。

校历的变革

校历同样反映出一种多元而灵活的时间观念。按照通常的理解, 私塾当然坚持一种灵活的日历方法, 这一点使其在农村地区特别方便, 这样, 儿童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帮家庭农作 (Borthwick, 1983: 35-36; Curran, 2005: 51; Thøgersen, 2002: 24-29)。私塾的时间灵活性体现在三个不同的方面。首先, 私塾坚持了一种可变的校历, 通常在春节之后开学, 并根据农历节日放假 (Borthwick, 1983: 35; Leung, 1994: 391-92; Rawski, 1979: 31-32)。其次, 私塾没有日常运行的正式时间。虽然他们一般也每天早上上学, 但至于什么是“早上”, 则有相当大的余地。⁸ 正如廖泰初表示的那样, “‘早上’对于‘张’来说可能意味着6点, 而对于‘藤’来说则可能是8点, 因为在这里没有刻度时间的方法 (Liao, 1949: 41)。”⁹ 最后, 学生根据他们自己的步伐学习课程。一位迟钝的、懒惰的、或经常缺课的学生可能需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记住一本书, 而一个更有天赋的、遵守纪律的、并坚持上课的学生可能只需要几个月。

⁶ 1旬=10天。定期市场的频率根据一系列因素而有所不同, 这些因素包括一定区域的人口和商品化程度 (参见 Arthur H. Smith [明恩浦], 1899: 148)。

⁷ 最重要的农历节日有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和端午节。

⁸ 参见 Arthur H. Smith (明恩浦) (1899: 77)。明恩浦在书中描述了山东的一所村小, “随着太阳升起, 他们【即学生】才可能开始精力旺盛的朗读。”

⁹ 这里, 廖用“张”和“藤”表示对于一个人来说的早在另一个人那里则未必早。

然而，无论私塾的时间表显得如何的灵活，詹姆斯·弗来斯（James Flath）提醒我们，“当我们将另一个社会进行社会文化的考察时，我们必须对我们自己熟悉的时间概念进行问题化处理（Flath, 2004: 52）。”当我们将私塾的时间表跟1904年引入的新校历相比较时，私塾确乎表现出非常灵活的时间特点。但那些每天身处私塾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尤其是学生，很可能并不那样认为。对于大多数的私塾来说，一天从黎明开始、到黄昏结束。许多学生都由他们的家庭和/或宗族强制按时入学，甚至晚饭后还必须回到学校学（Leung, 1994: 391-392; Rawski, 1979: 31-32）。只有在农历节日和庙会以及，偶尔，如果老师——自己预计某一天有空——稍作休息，学生才能有休息的机会（Kulp, 1966: 225; Rawski, 1979: 31-32; Leung, 1994: 391-92）。

当旨在规范从城市大学到偏远乡村的所有教育机构的新校历于1904年介绍进来并强制执行时，学生们身陷一个剧烈的变迁当中。校历依据年份和小时进行划分，并附以规定的学习课程，一个五年的初等小学课程和四年的高等小学课程。¹⁰每学年基于一个240天的日历，包括两个“学期”，每个学期120天，它们进一步由两个假期所划定，一个假期在冬天、另一个安排在夏天。每学期又进一步分为很多周，6天为一周，两周之间有一天休息（舒新城，1961: 2.413, 419, 432）。¹¹最后，每个在校日又被分解成很多个小时，每周指定一定数量的时间用于专门科目的学习。

20世纪早期的中国观察家和一些当代学者还持有E.P.汤普森（E.P. Thompson）现在看来已经过时的观点，即一方面认为现代时间跟收成的周期相冲突，另一方面还假定新校历对于引进村庄的新式小学有不良影响（Thompson, 1967: 59）。如廖泰初就声称，晚清学部与民国教育部照搬日本的校历强制执行小学秋季开学的规定。依据他的逻辑，秋季是一年当中最繁忙的农业季节，不是农村学校开学的适当时间，因为孩子们需要为家庭干农活，廖因此认为新校历不符合农村

¹⁰ 民国教育部在1912年缩短小学学制为4年。参见舒新城（1961），第2卷第419第432页。

¹¹ 在最早的1902年的学制中，有一个12天一周、第13天休息的规定。然而，这一法规从未得到执行。后来，在1904年的最后官方版本中，清学部采取了根据基督教日历的6天一周的学校日历。

时令。类似的，萨莉·博思威克（Sally Borthwick）也认为新的学校日历照搬日本校历在秋季开学，没有很好地与农村的时间观念相结合，而传统的私塾通常是春节后开学的（Liao, 1949: 20, 47; Borthwick, 1983: 35）。

博思威克和廖泰初都正确地强调了秋季时间表和农业时令的不相适应。但有必要根据学制规定和实践对他们的两个主张做更切近的考察。首先他们均凭经验简单地声称清季学部采用了日本秋季开学的学校日历。在1902年学制中关于初级小学的原初规定中，教育部门确实明确规定了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的开学日期和标准：第一学期学校的开学日期是农历正月二十日，第二学期的开学日期是秋收后的第六天（舒新城，1961: 2.413）。这些日期，尽管非常明确而不灵活，但完全符合当地的习俗和农业时令。在1904年的学制规定中，学部干脆不规定任何一个具体的开学时间，实际上是授权于地方当局决定学校应该什么时候开学。不规定一个标准化的和强制性的开学时间显示了晚清学部给予地方政府相当大的余地，以决定新学校在什么时候开始正式上课，以适应当地的农业生活。

博思威克和廖泰初的第二个观点是他们更概况的讲法，即新校历是强加给村庄社区而没有考虑当地时间实践的做法。但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海城县当局都没有规定一个固定的开学时间；它实际上都是由每个村庄的学校董事会来决定的。此外，在所有投入新的学校制度的有关行动者之间的一个不容置疑的共识是，学校应该在春节之后开学，正如他们一直做的那样。因此，在一些如学校日历这样的宏观时间单元问题上，国家和村民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合作关系。

在海城县，几乎所有的新式村小都在冬季开学，有时在春节假期之后，因此必然在正月初一和十五之间的某一天开学。春节之后开学的情况在清末民初的东北和华北地区似乎比较普遍。在邻近的盖平县，1906年成立的50所小学当中，有10所在正月开学，大概正好在春节假期之后，有30所则在农历二月开学（《盖平县志》，1930: 5.1-24）。¹²同样的，西德尼·盖博（Sidney Gamble）发现，在20世纪20、30年代

¹² 这些学校到1930年还在运行。

河北定县，大多数农村学校春节前后至少放假一个月，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在家里帮助准备春节节庆（Gamble, 1954: 199-200）。表1是基于海城县劝学所1907年春季检查而制成的43所学校的开学时间表。

该表显示，大部分学校都在冬季开学，在春节后的一个或两个月内。极少数学校开学较晚，在农历第三个月或者更晚的时候，该县当局认为有问题。尽管学校开学的时间跨越了4-5个月，显示了极大的灵活性，我没有发现县级有关学校开学日期的相关规定，那些开学很晚的学校被邀请到县当局遭受当局的干预。例如，1907年，当地处该县西北的莲花泡村小到第五个月还没有开学，劝学所主管这一地域的官员王泽如威胁说，如果村小在半个月内还不开学的话，将处以罚款并报告县当局。县随后下令调查，要求王对莲花泡村进行详细寻访，找出村民为什么尚未开学的原因。

海城县村小1907年第一学期开学日期表	
开学时间	学校数量
农历正月的下半月	15
农历二月的上半月	14
农历二月的下半月	10
农历三月的上半月	1
农历三月的下半月	1
农历四月	1
农历	
五月	1

表1

总数: n = 43.

来源：海城县公署档案馆（HXGDA），辽宁省档案馆，1905-31, 6.18122, 6.18124, 6.18130, 6.18120, 6.18117, 6.18123, 6.18132。

但重要的一点在于，尽管村庄在决定他们的开学日期问题上有很大的自主权，村庄仍然必须在国家确定的范围内开学，即把春节节后开学作为规范。进而言之，如果他们还达不到，他们将受到惩罚。

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县级行政当局有了执行时间的权力。县劝学所必须在代表中央政府和地方社会的利益之间保持谨慎的平衡。在海城县，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当它遭遇校历这样的宏观时间单元问题时，县劝学所对于当地习俗保持了高度的敏感性——就它自身的最佳利益而言，劝学所的官员均来自本地区域。此外保持出勤率和防止缺勤率的最好方法就是提升校历适应村庄社区的水平。事实上，很明显，中央政府也认同这个观点，这就是为什么1904年学制把1902年学制中规定的固定开学日期删除的原因所在。不过，作为国家新建的一个管理部门，劝学所不能显得自己太宽松，就像莲花泡村小学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

耿家庄子村的案例则进一步说明了，劝学所不仅对当地的时间观念表现出相当的敏感，而且还对村庄生活起到了一个新的干预作用。当村庄的两等初级小学的两名管理人员要求劝学所在收缴学费问题上制定一个官方政策时，劝学所自己主动对支付学费的日期定了标准，规定一年两次在两个主要的假期收集（HXGDA, 6.17858）。通过固定收缴学费的日期，劝学所把一种传统的习惯实践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样做，劝学所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保留传统收缴学费的日期有助于减轻新的学校制度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其次，通过固定缴款日期，劝学所增加了村民按时缴纳学费的机会。

大多数海城县的农村学校能够遵守新的校历。然而，偶尔也有村民发现新校历违背了他们的最佳利益，如以下事件所暗示的那样。1907年，有一些村庄首领，考虑到他们村的经济情况，向县当局要求他们是否可以稍微改变一点学制，执行小学四年制而不是中央规定的五年制。这个例子实际上是村民意识到他们未能按规定执行可能要被罚款，所以采取了自己在被抓之前寻求打破规定的策略。虽然没有看到关于他们诉求结果的信息，重要的是，村民试图与县当局对话，以便改变局势从而有利于自己（HXGDA, 6.18124）。

事实证明，仅仅几年之后的1912年，民国教育部就对小学的校历做了一些重大修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把小学的年代从

5年减少到4年，很可能它自己认识到5年的学制对于很多中国的农村孩子来说是不切实际的（舒新城，1961: 2.450）。¹³ 新规定还对学生每周的学时数略有减少。但同清朝的规定一样，民国的法规也没有为学校规定任何一个正式的开学日期。尽管海城县的档案没有关于1912年后大多数学校开学日期的信息，但盖平县的证据表明，春节后开学的习俗在清末民初之间仍然非常流行。在1912年到1917年之间办学的94所村庄小学中，有80所是农历二月开的学，都在春节之后不久（《盖平县志》，1930: 5.1-24）。¹⁴

说到学校的假期，1904年的学制规定似乎有些偏离中国东北悠久的农业实践。虽然学制规定的寒假因为春节的重要性很好地适应了农村社区的生活，但暑假却与中国东北的种植模式相冲突。高粱和谷子——两种典型的春种秋收作物——构成农业经济的一大部分，使得秋季的假期更适合农村社区的生活，因为那样的话学龄儿童可以作为秋收的劳动力而得到利用。¹⁵ 档案中大量的间接材料表明，在清末民初之际，海城县的学校在夏季的几个月里仍然在上课。学生夏季入学意味着他们要么享受了一个秋季假期而不是规定的夏季假期，要么根本没有假期。后甘沟子村的孩子，从1906年到1913年都步行到邻村的大路沿小学去上学，他们抱怨说夏季的大雨淹没了道路和阻挠他们的去路（HXGDA, 6.17776）。另外，还有在1919年，来自于新台子村东边的女生，也因为夏天雨季、道路淹没而使她们到位于村庄西边的学校去上学有不少麻烦（HXGDA, 6.19135）。

华北地区的村庄民族志材料也支持农村学校夏季上学的观点。盖博（Gamble）所评论的定县63所新式村小中，只有翟城村的1所学校是真正在暑假关闭的。其余62所学校均在夏季继续开放，但在

¹³ 同时，高等小学的课程由4年缩短为3年。

¹⁴ 剩下的14所学校没有明显的模式：其中有3所在三月份开学，1所在四月，4所在五月，1所在六月，1所在七月，1所在八月，1所在九月，以及2所在十月开的学。

¹⁵ 我的这一说法基于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 1998）和黄宗智（1985）的研究。艾仁民的《国家、农民和商人》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中国东北农业经济的最为深入的讨论。黄宗智的《小农经济》第61页，介绍了中国华北地区高粱和谷子种植的一个时间表，这一时间表在东北是相似的。

秋收期间关闭，在春小麦收获季节再次关闭约2周的时间（Gamble, 1954:199-200）。日本的民族志学者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研究指出，在河北省沙井村存在类似的模式，沙井村小学的学生在春小麦收获季节放假2周，在秋收季节放假三周。而在夏季他们则继续上学（Niida, ed., (1952-1958): 1.93）。丹尼尔·库尔普（Daniel Kulp）1918年和1919年在广东省的凤凰村所做的民族志研究发现，那里的采用了现代校历的旧式学校分别在冬季、夏季和秋季都有假期，跟东北和华北地区的模式有点不同（Kulp, 1966: 225-226）。库尔普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学校放假取决于各个区域的种植模式。

一周六天制的采用代表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与过去的决裂，它反映了对儿童生活规制程度的增加。在过去，如果一个学生不管什么原因错过了一天，一星期，甚至一个月的学习，他可以轻易地重新捡起他落下的部分而不必担心掉队。在新的制度中，日常考勤对于学业成绩来说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课程的新的时间框架不仅有助于规范学生，也有助于规范家长。学生离校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包括生病、经济困难、以及家庭需要，等等。但是新的一周六天的制度远不如先前的制度那样可以容纳这些情况的发生。

至少在城市地区，民国期间一周七天制的日益推广相对来说没有遭遇到多少争议，因为很多人都通过出国旅行或传教士接触到周的概念（Harrison, 2000: 69）。当然，像海城这样的县域，村民是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传教士和教会学校的。因此，他们很可能对周的概念不熟悉。然而，他们也没有发现新的学校周历有什么特别破坏性的方面。事实上，私塾几乎每天都上学的旧例为新式学校准备了生源。新引进的校历，唯一显著的差异就是学生可以在星期日休息，虽然在中国的有些学校，学生在星期日还得复习功课，证据表明，旧的做法很难消亡（参见Harrison, 2000: 69, 89n.81; Kulp, 1966: 227）。¹⁶但在海城县的乡村学校，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们在1912年以前就

¹⁶ 库尔普在《乡村生活》（第227页）中报告说，1919年的凤凰村新式小学，学生在星期天也上课，但他们那一天的学习负担相对轻点。库尔普还解释说，虽然新式老师想星期日放假，但他担心激怒村民，因为他们反对这个想法。

开始忠实地执行每周六天的制度了（HXGDA, 6.18221, 6.18222, 6.18130, 6.18120, 6.18124, 6.18117, 6.18132）。

时钟时间的引进，比年和周的时间概念，给海城县的学校生活、进而更广泛的社区生活，带来了更大程度的结构、纪律和监视。关于小学是否必须有机械钟这一点，1904年和1912年的学制规定都是模糊的。1904年的学制列举了很多教室必备的设施，但时钟不是其中之一。1912年的学制规定了小学必须备有合适的“学校用品”，但也没有提到时钟（舒新城,1961: 2.431, 452）。然而，在海城县，不仅很多学校都购买一块时钟，县政府也认为这是必需的一个设备。例如，1906年，在腾鳌堡两等初小的帐簿上，一台座钟是一系列学校用品中的一件（HXGDA, 6.17782）。1917年，检查小学的劝学所官员会立即报告学校是否没有自己装备时钟。同样的，在同一年，另一个劝学所官员报告说，学校没有算盘、黑板、或时钟（HXGDA, 6.19035; 6.19036）。¹⁷ 在时钟时间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再一次表现出适应实际乡村生活的努力。无论1904年还是1912年，中央都没有指定学校开学的精确时刻。相反，这些规定均暗示，只要地方学校坚持每周六天的制度，每个班级保证了足够的学习时间，地方当局甚至每个学校都有权自行决定开始上课的时间。然而，乡村学校一般都在上午八点或九点开始上课，中午有几小时的午餐时间，然后在下午三点或四点放学。

尽管中央政府没有规定一个具体的上课时间，但就像把年后开学逐渐制度化一样，地方劝学所把标准的上课时间规定为早上八点或九点。1917年，一位劝学所的官员到沙河沿村小学视察，他9点到达学校，发现学生差不多已经上了一节课了。这位官员还表示，每天沙河沿村小学从上午9点开始唱起嘹亮的歌声，他很高兴村小的生活得以系统化。但另一个周一到常家沟村小学门口视察的官员报告

¹⁷ 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农村，时钟不仅越来越被看做一个重要的时间仲裁者，也日益成为人们审查和迷恋的新宠，甚至可能成为被占用和储藏的对象。李怀印（Huaiyin Li, 2005: 229, 282, n. 7）描述了1915年河北省上庄村发生的一个案例。路观光，一个当地“恶霸”、学校校长，把村小的时钟占为己有。当一名劝学所官员去路家追回赃物时，路的儿子还动手打人。李的例子表明，中国的村民认识到时钟作为现代符号的价值并把获取决定时间的时钟作为一种权力的来源。

说，直到上午9点，老师还没有到达学校，33名学生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HXGDA, 6.19035）。虽然这一官员没有明确提及学校应该在一天的什么时间开学的任何规定，但他的报告，点名道姓地指出了老师的名字，表达了对于他不遵守时间的不满。

劝学所也逐渐把小时时间作为一种值得观察和标记的现象。例如，1907年，一位劝学所官员视察了庙宇岭村小学。他在报告中指出，学生从早上8点开始上课，中午12点午餐，下午2点回到学校。乍一看，这一作息时间稀松平常。但仅仅在几年前，当地政府分解时间的作息制度对于村民、学生、甚至老师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十年后，劝学所官员对学校进行检查时会明确指出学生应该到校的确切时间以及到校时应该做什么的明确规定（HXGDA, 6.19035; 6.19036; 6.19037）。

其他人已经注意到并开始讨论民国时代学校越来越关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活动。詹姆斯·卡特（James Carter）对哈尔滨东华学校的研究描述了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什么时候吃饭到什么时候锻炼，都是依据现代时钟时间来安排的。同样地，罗伯特·库尔普（Robert Culp）发现，长江下游地区的一些中学往往在一天的特定时间安排相应的活动，这一趋势有助于在部分学生和管理人员之间创造一种集体意识，即他们的学校是“一个有序的社会团体（Carter, 2002: 61; Culp, 2007: 167）。”

在海城县，对学校时间的微观管理有时甚至超越了小时这一时间单位。分钟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相关的时间片段用来组织学校生活并作出判断。1912年，牌楼屯两等初级小学有一个管理学生考试的规定，上面载有依据时间的若干规定，这表明微观的时间单位是一种保证纪律和秩序的有效方法。第1条规定，考生不能迟到。如果他们迟到超过三分钟，他们将被记过一次。第12条规定，如果考题宣布后，一个考生有不大清楚的地方，他有5分钟的时间提出问题。之后，他将被禁止提问（HXGDA, 6.17611）。

新的校历对于海城县的农村社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时间管理是国家可以以福柯的方式规训其成员的一种方式，这类似于17

世纪的西欧，当时“工厂、学校、军队，都实行一种时间的微观处罚制度（包括迟到、缺勤、任务的中断）（Foucault, 1979: 178）。”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当以时间管理的学校教育和新的教育行政机构引进到乡村社会，教师和学生的活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监管。如果他们没达到新设的标准，他们将受到更多的审查和纪律处分，包括被罚款、上报当局、并对其缺点予以惩罚。

然而，以上关于校历的讨论意味着新的教育制度并不是简单地由国家灌输到地方社区的。相反，从规定到实践，均是由中央的改革者、县级官员和村民参与，通过一个复杂的适应过程形塑而成。这些不同的群体经过斗争和谈判最终创造出一种学校制度——以及校历——既非常的现代又颇具中国特色，它扎根于预先存在的时间理解之中，但同时由新引进的时间单位（如小时和星期）所激发（VanderVen, 2012: 11-12）。

因此重要的是，校历也提供了另一种时间系统，人们可以借此安排他们的生活。因此，它对于一些村民来说代表了一个新的机会，特别是那些到新学校上学的人们，他们相当于一次性加入了几个不同的社区。年历是一种相对灵活的时间概念，它代表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当地社区，而一周六天的周历和时钟时间，以前所未有的系统化程度和微观管理，则代表了一种新的、更加国际化的社区。这一新的社区执行的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而不是以县和村为中心的时间标准，这一关键的时间单位鼓励学生在更广泛的社会秩序中取得认同。

参考文献

- Aveni, Anthony (2002) *Empires of Time: Calendars, Clocks, and Cultures*. Boulde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Press.
- Borthwick, Sally (1983)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The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Era*.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Carter, James (2002) *Creating a Chinese Harbin: Nationalism in an International City, 1916-1932*.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ulp, Robert (2007)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 1912-194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Curran, Thomas (2005) *Educational Reform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Failure of Educators to Create a Modern Nation*.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 Elliot, Mark C. (2005) "Whose Empire Shall It Be? Manchu Figurations of Historical Process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ime, 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 ed. Lynn A. Struve: 30-72. Honolulu: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Enatsu, Yoshiki (1991) *The Rise of the Fengtian Local Elite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Flath, James A. (2004) *The Cult of Happiness: Nianhua, Art, and History in Rural North Chin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 《盖平县志》(1930): 16卷。再版台北成文(1973)。
- Gamble, Sidney (1954) *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Gottschang, Thomas R. and Diana Lary (2000) *Swallows and Settlers: The Great Migration from North China to Manchuri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海城县公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1905-1931): 在本文中引证为HXGDA, 目录及卷号。
- 《海城县志》(1987) 海城市: 海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Harrison, Henrietta (2000)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5)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何劲 (1911) "说两等小学读经讲经科之害"《教育杂志》, 第3号第5期: 第52-54页。
- Huang, Philip C.C. (1985)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Isett, Christopher (1998) *State, Peasant, and Agrarian change on the Manchurian Frontier, 1664-194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教育大辞典》(1997)上海教育出版社。2卷。
- Kulp, Daniel Harrison II (1966)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Phenix Village, Kwantung, China. Taipei: Ch'eng-Wen.
- Leung, Angela Ki Che (1994)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ed. Benjamin 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 381-41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Huaiyin (2005) *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1875-193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李喜平 (1998) 《辽宁教育史》 沈阳: 辽海出版社。
- 《辽宁教育史志资料》(1990)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4卷。
- Liao T'ai-Ch'u (1949) "Rural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A Study of the Old-fashioned Chinese Schools (Szu Shu 私塾) in Shantung (山東) and Szechuan (四川)." *Yanching (燕京)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4, 2:19-67.
- 罗志田 (1998) "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 第4期: 第185-196页。
- (2006) "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中国社会科学》, 第1期: 第191-204页。
- Mitter, Rana (2000)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iida Noboru, ed. (1952-1958) *Chugoku noson kanko chosa (Investigations of customary practices in rural China)*. Tokyo: Iwanami, 6 vols.

- Raws, Evelyn Sakakida (1979) *Educational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Shao, Qin (2004) *Culturing Modernity: The Nantong Model, 1890-193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iba, Yoshinobu (1977) "Ningpo and Its Hinterland,"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舒新城 (1961)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3卷。
- Smith, Arthur H. (1899) *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 Smith, Richard J. (1988) "A Note on Qing Dynasty Calendars," *Late Imperial China* 9, 1: 123-45.
- Spence, Jonathan (1996)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New York: Norton.
- Struve, Lynn A. (2005) "Introduction," in *Time, 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 ed. Lynn A. Struve: 3-27. Honolulu: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Suleski, Ronald (2002) *Civil Government in Warlord China: Tradition, Modernization and Manchuria*. New York: Peter Lang.
- 孙景悦、董慧云、张秀春 (1993) 《张学良与辽宁教育》。香港同泽出版社。
- Thøgersen, Stig (2002) *A County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een from the Village Schools of Zouping, Shando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Thompson, E.P. (1967) "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1967): 56-97.
- Vandervan, Elizabeth (2005) "Village-State Cooperation: Modern Community Schools and Their Funding, Haicheng County, Fengtian, 1905-1931," *Modern China* 31, no. 2 (April) 204-35.
- . (2007) "It's Time for School: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Calendar in Haicheng County Primary Schools, Northeast China,, 1905-1919,"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2:2: 60-83.
- . (2012) *A School in Every Village: Educational Reform in a Northeast China County, 1904-1931*.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Wang, Liping (2000) "Tourism and Spatial Change in Hangzhou, 1911-1927," in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ed. Joseph W. Esherick,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Zerubavel, Eviatar (1981) *Hidden Rhythms: 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